



Urban Poverty in Space:
Patterns, Correlation and Perceptions

空间视角下的 城市贫困：

格局、耦合与感知

..... 薛东前 马蓓蓓 等/著



科学出版社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转型期西安市新城市贫困时空分异与效益评价研究”(41171142)

陕西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新城市贫困人群居住地迁移的路径、意愿及对策研究”(2015KRM147)

陕西师范大学优秀著作出版基金

资助出版

Urban Poverty in Space:
Patterns, Correlation and Perceptions

空间视角下的
城市贫困：

格局、耦合与感知

..... 薛东前 马蓓蓓 等/著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空间视角下的城市贫困：格局、耦合与感知 / 薛东前等著 .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6

ISBN 978-7-03-053331-9

I. ①空… II. ①薛… III. ①城市-贫困问题-研究-西安 IV. ①D63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30596 号

责任编辑：杨婵娟 李嘉佳 / 责任校对：张小霞

责任印制：张欣秀 / 封面设计：无极书装

编辑部电话：010-64035853

E-mail: houjunlin@mail. sciencep.com

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北京建宏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7 年 6 月第 一 版 开本：720 × 1000 B5

2017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19 1/2 插页：4

字数：320 000

定价：9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序 言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西方国家从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过渡的过程中，普遍出现了一个以城市失业人员为主体的贫困群体，并且呈现出区域性和阶层性等特点，该群体与以老年人、残疾人等为主体的传统城市贫困群体共同构成了现代城市的贫困主体。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和社会改革的深入，我国的城市贫困既区别于改革开放前低水平的、相对均衡的普遍城市贫困，也区别于改革开放初期以“三无人员”为主体的传统城市贫困，是一种在社会急速发展和城市化快速推进的背景下出现的，且以有劳动能力和劳动意愿的城市贫困人口占绝大多数的“转型期贫困”。民政部统计显示，当前我国的城市贫困在地域上主要集中在中西部欠发达地区、老工业基地和资源枯竭型城市。

薛东前、马蓓蓓等撰写的《空间视角下的城市贫困：格局、耦合与感知》一书，敏锐地捕捉到了我国西部超大型城市、老工业基地西安市在社会经济转型和城市化快速推进时期出现的城市贫困问题，并运用地理学的空间视角予以解读和分析。相较于西方发达国家和东部发达地区，西安市的城市贫困具有连续性强、规模大、类型多样的特点，而且是在区域发展水平较低、财富积累不足的背景下产生的“未富而新贫”，因此在认识和治理上，存在着更大的困难和挑战，也更需要学界和政府的持续关注 and 深入研究。

该书的主要特色可归纳为以下三点：第一，长时间序列的跟踪研究，资料翔实，研究深入，对西安市 1990 年以来的城市贫困状况与发展进行了精准的描摹。该书综合了普查资料，民生、环境、经济和城市建设等统计资料和规划资料，开展了多次问卷调查和访谈调查等形式的实地调研，获得了 3000 余份调研问卷，得到大量有价值的数据，并对西安市城市贫困的空间格局、人口属性及与其他要素的时空耦合关系进行了系统的刻画。第二，立足于宏观和微观两个视角，在城市社会学和行为地理学相关理论的指导下，甄选不同贫困主体和贫困程度的典型区，对贫困群体的日常行为、时间管理、客观生活质量和主观生活感知进行了生动的再现。第三，研究方法多元，综合使用了 GIS（地

理信息系统) 空间分析、计量模型分析等定量分析方法, 以及语义分析等质性研究方法, 在表达方式上图文并茂, 直观性强, 强烈地突显了地理学的空间视角和表达特色。

该书弥补了现有城市贫困研究对长时间序列的系统研究较少、对时空分异及演化规律关注不足的缺陷, 提供了探索城市贫困问题的新视角, 丰富了城市地理学和城市社会学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在实践上, 有助于从较长的时间序列上, 科学认识我国转型期的城市贫困问题, 为优化城市空间结构与社会结构提供科学依据。

基于此, 我十分高兴地将该书推荐给读者, 希望对城市贫困及其空间格局研究, 特别是西部大城市城市社会研究产生积极作用。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研究员 姚士谋

2017年1月于南京

前言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在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和城镇化快速推进的背景下,伴随着劳动就业制度、住房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一系列改革,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长期形成的旧的城市利益格局被打破,基于收入不平等的城市社会分层和空间隔离现象逐渐显现。欧美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城市贫富阶层的两极分化与空间隔离不仅危害城市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也将对城市文化、城市管理、城市环境保护和社区建设等诸多方面产生深远影响。

本书基于地理学的空间视角,利用普查数据、统计资料和调研访谈资料,通过宏观和微观两个切入点,对 1990 ~ 2013 年西安市的收入不平等状况、贫困阶层聚居状况、贫困格局与城市功能格局及城市环境的耦合关系、城市贫困阶层的微观行为特征和生活感知等展开系统研究,以探讨 20 余年来快速城市化过程中西安城市贫困的发展特征、问题与区位化规律,为西部地区的城市社会经济转型提供研究基础和决策依据。

本书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转型期西安市新城市贫困时空分异与效益评价研究”(41171142)和陕西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新城市贫困人群居住地迁移的路径、意愿及对策研究”(2015KRM147)的研究成果。全书共分为七章,第一章为空间视角下的城市贫困研究综述;第二章和第三章分别从收入不平等和贫困阶层聚居两个切入点来探讨西安城市贫困的时空格局;第四章和第五章从要素耦合的视角,分别研究了西安市的城市功能格局与城市贫困、城市环境与城市贫困;第六章和第七章则是从行为地理学的研究视角出发,对西安城市贫困典型区内的贫困居民微观行为特征和生活质量感知进行分析。

本书由薛东前、马蓓蓓整体设计、撰写和统稿,范晨辉、罗正文、吕晓芬、赵奂、郭瑞斌和黄晶等参与了部分章节的撰写,吕玉倩、李海玲等参与了书稿的整理与校对工作,贾金慧、刘精慧、马中平、万斯斯、顾凯等参与了数据整理工作。本书得到陕西师范大学优秀著作出版基金的资助,在此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本书是第一部系统研究西安市贫困空间格局的著作，在写作过程中数据获取难度较大，贫困标准多元，研究方法多样，与其说本书是一项研究成果的汇集，不如说是关于城市贫困空间格局在各领域的探索，以期为城市规划建设、精准扶贫和构建和谐城市助绵薄之力。本书可作为从事城市规划、城市社会等领域的研究者和爱好者的参考书，也可供地理学、社会学等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参考。

由于本研究的工作量较大，研究时间较为紧张，也受研究能力和资料来源等条件的限制，本书尚有缺点和不足，敬请读者不吝赐教。

薛东前 马蓓蓓

2017年1月于西安

目 录

► 序言	/ i
► 前言	/ iii
► 第一章 绪论	/ 1
► 第二章 收入不平等与城市贫困	/ 10
第一节 收入不平等与城市贫困研究综述	/ 10
第二节 西安市收入不平等对贫困的影响	/ 16
第三节 西安市收入不平等与贫困的空间演化关系	/ 31
第四节 西安市收入不平等与贫困演化的影响因素	/ 50
► 第三章 贫困阶层聚居与城市贫困	/ 62
第一节 城市贫困阶层聚居研究综述	/ 62
第二节 西安市城市贫困阶层的基本特征	/ 66
第三节 西安市城市贫困阶层聚居研究	/ 77
第四节 西安城市贫困阶层聚居的形成机制与效应	/ 100
► 第四章 城市功能格局与城市贫困	/ 105
第一节 城市功能格局与城市贫困研究综述	/ 105
第二节 西安市城市贫困格局及演变	/ 108

第三节	西安市城市功能格局及演变	/ 116
第四节	西安市城市贫困与城市功能格局的时空耦合	/ 124
►	第五章 城市环境与城市贫困	/ 139
第一节	城市环境与城市贫困研究综述	/ 139
第二节	西安市城市环境格局及演变	/ 142
第三节	西安市城市环境与贫困格局的时空耦合	/ 161
►	第六章 城市贫困居民的微观行为	/ 177
第一节	城市贫困居民微观行为研究综述	/ 177
第二节	西安市城市贫困典型区甄选	/ 181
第三节	西安城市贫困典型区居民微观行为特征	/ 189
第四节	典型区居民主要行为活动的时空间结构	/ 212
►	第七章 城市贫困群体生活质量感知	/ 240
第一节	城市贫困群体生活质量感知研究综述	/ 240
第二节	西安城市贫困现状及典型区贫困人口属性	/ 243
第三节	典型区贫困群体客观生活质量测度	/ 252
第四节	典型区贫困群体主观生活质量感知	/ 267
第五节	贫困群体生活质量感知的形成机制	/ 281
►	参考文献	/ 291
►	彩图	

第一章 绪论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城市贫困问题具有高度的综合性，既包含经济意义上的贫穷，也是社会意义上的权利剥夺，同时还存在一定的区域性，也就是地理学所侧重的空间视角（Wu，2004）。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和社会改革的深入推进，劳动就业制度、住房制度、企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一系列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促使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旧的城市利益格局被打破，新的城市社会关系被重构，一个下岗、失业、在岗低收入人员和流动人口为主体的新城市贫困阶层迅速形成（刘玉亭等，2003）。该群体逐渐取代了以“三无人员”为主的传统城市贫困人群，成为我国转型期的城市贫困主体（袁媛等，2009）。在实行城市土地有偿使用、住房商品化以后，我国的城市贫困阶层出现了明显的空间集聚态势。各地大量涌现的城中村、厂中村、棚户区、危旧改造区和外来人口集聚区等成为转型期我国城市贫困阶层集聚的典型区域（顾朝林等，2013）。北京市2016年棚户区改造和环境整治任务显示，北京市16个区共有城中村335个；西安市城中村改造办公室数据显示，2016年西安市共有城中村257个；《松江区土地规划纲要（2010～2020）》显示，2015年上海市仅闵行区就有城中村61个。这些城市贫困集聚区普遍存在着基础设施不完备、建筑破败、环境恶劣、治安混乱等一系列问题，成为制约城市和谐健康发展的“灰色区域”（谌丽等，2012）。欧美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社会弱势群体的空间集中，有可能产生更为严重的社会隔离和阶层对立，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孙斌栋和刘学良，2009；Abramson et al., 1995）。因此，城市贫困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妥善治理，城市贫富阶层的两极分化与空间隔离将会进一步加剧，不仅危害城市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也将对城市文化、城市管理、城市环境保护和社区建设等诸多方面产生深远影响（Danziger and Gottschalk,

1987；冯健和周一星，2008）。

当前我国的城市贫困在中西部欠发达地区、老工业基地和资源枯竭型城市表现得更为突出（方创琳和刘海燕，2007；Chen，2011）。相较于西方发达国家和东部相对发达地区，我国西部地区的新式贫困具有连续性强、规模大、类型多样等特点，而且易在区域发展水平较低、财富积累不足的背景下产生“未富而新贫”的现象（高云虹，2010；暴向平等，2015）。因此在认识和治理上，也存在着更大的困难和挑战。当前，我国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心已经从基础设施建设转向保障和改善民生（刘卫东，2010）。在这样的背景下，从空间的视角来探讨西部地区城市贫困的产生发展、时空格局、区位化规律，以及贫困群体的行为模式和生活感知，对科学全面认识和治理城市贫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城市贫困的内涵

1. 西方国家的城市贫困

西方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起步较早，经过多年的发展，目前西方国家对城市贫困问题的研究已经比较成熟（Lincoln，2012；Manya et al.，2007）。在城市贫困的界定上，已从收入贫困扩展到能力贫困、权利贫困、底层阶级和社会排斥。在城市贫困的成因上，形成了包括个人主义、贫困文化、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的多种理论解释。在新城市贫困的治理上，也形成了系统化的应对策略（Martin，1993；Massey，1990）。

19世纪，西方学界对城市贫困的早期研究主要从“缺乏”的角度出发，认为城市贫困是指城市居民缺少在社会中生存和生活所必需的资源、物品、金钱、社会地位等（Myers，1988）。《大英百科全书》中对贫困的定义为“个体缺乏在当时社会最基本的财富和物品的存在形态”。此类定义说明贫困是一种缺乏的状态，既有可能是缺乏物质方面的经济资源和实物资源，也有可能是缺乏精神层面的文化资源和社会关系资源。而且这种状态不是固定的，而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变化的（Curley，2005）。后来城市贫困的内涵扩展到“能力”的范畴，如世界银行认为贫困是由于个体不具备某种能力使其未能达到正常生存的水平（Aghion et al.，1999；Alcock，2006）。

20世纪70年代中期，西方国家在从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过渡的过

程中,普遍出现了一个以在岗低收入者、城市失业人员、移民、无社会保障和特殊家庭等为主体的贫困群体,并且呈现出区域性和阶层性等特点。该群体与以老年人、残疾人等为主体的传统城市贫困有着本质的区别,被称为“新城市贫困”(new urban poverty)。目前新城市贫困问题一直受到西方政府和学者的广泛关注(Alkire and Foster, 2008; Bonaiuto et al., 2003)。

在城市贫困的空间性领域,贫困阶层聚居特征和区位化规律是社会学者和地理学者最关注的话题。基于不平等和贫困,社会学者和地理学者提出了城市地域结构模式形成的影响机制。芝加哥学派最早对城市地域结构模式提出范式,贫民窟、有色人种区、犯罪集聚区在城市地域中的分布具有同质性(Yeates and Garner, 1980)。之后被发展为经典的的城市地域结构模式,主要包括伯吉斯的同心环模式、霍伊特的扇形模式和哈里斯、厄尔曼的多核心模式(Park and Burgess, 1925; Hoyt, 1939; Harris and Ullman, 1945)。后现代发展时期,发达国家的城市聚居区分为高级居住区、中产居住区、近郊城区、租住结合区和衰落城市中心区。贫困群体更多地聚居于衰落城市中心区之内,即“贫民窟”,与外界的沟通和联系几乎被切断,这对于贫困阶层自身脱贫和社会有序发展造成非常大的阻碍(John and Kasarda, 1993; Fellman et al., 1992)。发达国家的城市贫困阶层总体上呈现出空间扩张,以及内城贫困问题突出的特点。北美城市研究表明,新城市贫困空间大多在中心区内部、中央商务区(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 CBD)外围;英国中等城市贫困和低中收入阶层主要分布在城市外围边缘区;澳大利亚主要城市贫困阶层由市中心向郊区集聚(Mann, 1965; World Bank, 2000)。

2. 我国的城市贫困

20世纪90年代之前,我国的城市贫困主体为以“三无”人员为代表的传统城市贫困(闫小培, 1999; 陈果等, 2004)。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目前的城市贫困主要为转型期的结构性贫困,城市贫困问题更容易发生在离退休人员、低文化水平者及从事服务业的人群中,并具有一定社会分层特征,阶层性明显,且易以群体形式出现,农民工群体是城市贫困高发群体(周春山, 1996; 何深静等, 2010)。民政部发布的《2013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3年年底我国的城市低保平均标准为每人373元/月,城市低保对象共有2064.2万人,其中城市“三无”人员8.6万人,其余均为下

岗、失业、在岗低收入等新城市贫困人口。在空间上，我国的城市贫困群体也出现了阶层聚居和居住隔离的空间特征，某类城市贫困阶层通常按照一定的地缘关系集聚，形成团状、条带状、散点状和片状等不同形式，体现了在生存方式、行为规则、关系网络乃至观念上与城市其他区域的显著异质性（周素红等，2010；余建辉和张文忠，2010）。

三、城市贫困研究的理论基础

（一）经济学的贫困理论

1. 古典经济学的解释

古典经济学认为，在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贫困是个人行为和市场调节相互作用的结果。在自由竞争市场条件下，劳动力的市场价格是由劳动力的供给所决定的，如果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其市场价格会降低，这样将导致劳动报酬下降，一部分工人因此陷入贫困。这部分劳动人口由于贫困则减少生育，最终人口增长受到限制，劳动力供给又开始下降，劳动力供给下降后，劳动力价格就会自然回升，然后进入新的循环调节（Mann, 1965）。也就是说，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可以通过约束个人行为来规范劳动力供给，从而使得贫困问题得到解决，所以政府和社会没有必要对贫困者提供帮助和救济（王志标，2009）。

2.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解释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市场似乎不是万能的，不能自动解决所有问题。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对此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其因卓越贡献被后人称为“资本主义的救世主”（Gans, 1972）。他认为一个社会的就业是由有效需求决定的，有效需求是指商品的总供给和总需求达到价格均衡时的需求。当总需求价格大于总供给价格时，社会对商品的需求超过商品的供给，资本家就会扩大生产规模；相反，如果总需求价格小于总供给价格，就会出现供过于求的状况，资本家被迫降价出售商品，如果无法实现其最低利润就会减少工人数量。当大量资本家这样做时，就会出现大量失业人口。市场调节不能减少贫困，在自由资本主义条件下，不足以实现充分就业，因而非自愿性失业将会长期存在，贫困问题也将随之而来。凯恩斯（1983）认为政府干预经济是解决失业和复兴经济的最好办法，首先采取赤字财政政策和膨胀性的货币政策使政府

开支扩大,接着降低利息率,从而刺激消费,增加投资,以提高有效需求,实现充分就业,达到减少贫困发生的目标。

(二) 马克思主义贫困理论

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产生过程的研究,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城市贫困产生的根源在于其社会经济制度。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导致工业社会贫困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资料的不平等占有。资产阶级通过占有生产资料来榨取工人阶级的剩余价值,从而导致后者陷入贫困。为了最大限度地追求利润,资本家总是要以最低的价格雇佣工人,在这种生产方式下,尽管工人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但是本身并不能享受这些财富。即使在资本增长、分工扩大和技术进步的情况下,所带来的财富也更多地以利润的形式被资本家拿走,而工人不仅工资不会有大的提高,还随时面临失业的危险。由此可见,工人阶级的贫困不是由于自身愚笨或者不勤劳,也不是由于社会整体财富不足,而是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只有通过改变社会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困。

(三) 多维贫困理论

阿马蒂亚·森(2002)最早提出多维贫困理论,他认为贫困不仅仅是收入低于贫困线的问题,更是人们享受自由等基本能力限制的问题。多维贫困最中心的思想是贫困不仅指个人的收入贫困,还应该包括与生活息息相关的方面,如教育、住房、医疗、保障、公共设施等一系列其他客观指标。收入低及物质的匮乏只是贫困的一种基本体现,健康水平、受教育、参与社会生活的机会和途径都是贫困的表现指标。因此,贫困是一个多维度的现象。目前多维贫困的主要测度方法有H-M指数、HPI人类贫困指数、CH-M指数、F-M指数、W-M指数,最近发展起来的有MPI指数、AF法等(范晨辉等,2015)。多维贫困指数有以下几点特征:多维贫困某一维度的改善,不影响另一维度的剥夺状况;多维贫困指数的基数为0;贫困指数随着贫困状况的改善而降低;将维度矩阵复制多次不会改变贫困程度;某一维度的微小变化不会导致贫困指数的剧烈变动;贫困指数可按人口、地区、维度等分解;基本需求的提高不会降低贫困程度;贫困指数是人口规模的非增函数;各维度的值和临界值成比例变化不会影响贫困指数的大小(Chakravarty et al., 2008; Bett et al., 2003)。

（四）社会剥夺理论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西方社会在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影响下，城市贫困人口增加，贫困人口在各方面处于不利状况。新政策带动经济和社会发展，而在相对富裕的社会如何定义和度量新城市贫困、如何分配公共资源及评估政策的有效性等问题都需要解决（Richardson and Grand, 2002）。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国外学者开始了对社会剥夺概念及指标的研究。社会剥夺是从事贫困问题研究的学者们提出来的，起初是指越南战场的美国士兵生活舒适但心理不满足的状态。英国的汤森最早定义其概念，他认为社会剥夺是指缺乏日常所需的食物、衣物、住房、教育、工作和社会活动等社会上大多数人认为或风俗习惯认为应该享有的东西（Atkinson and Kintrea, 2001）。社会剥夺可分为个体剥夺和地域剥夺，如果个体或地域经历多种类型的剥夺，则为多重剥夺状态。剥夺的指标体系包含剥夺涉及的若干方面及每个方面包含的相互独立的指标，如收入、教育、就业、环境等，指标一般来源于普查数据、地方或行政管理部的调查数据（袁媛和吴缚龙，2010）。

（五）社会排斥理论

法国学者勒纳用来描述经济中的排斥现象时率先提出社会排斥（social exclusion）的概念，现在其内涵已远远超出经济领域，扩展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社会排斥不仅包括经济上处于贫困状态及物质资源严重匮乏，还包括弱势群体被排挤无法融入主流社会而逐渐被边缘化的过程。由此可见，社会排斥主要是指社会弱势群体由于收入、能力、资源、权利的不足而在劳动力市场、社会服务和社会关系三个方面被主流社会群体所排斥，而日趋成为边缘群体（李斌，2002）。社会排斥程度越大，弱势群体就越不容易摆脱贫困，贫困的持续时间可能就越长，贫困群体在空间上聚集可能性就会越大，而这种贫困群体逐渐被边缘化和空间上的聚集会导致贫困程度的加深，最终形成一种恶性循环（Silver, 1995）。

社会排斥主要强调了公民的参与性、相对性、地域性等，其形式和内容包括经济、政治和社会等多方面的排斥（格伦斯基，2005）。社会排斥的类型也很多样。例如，由社会结构的不合理造成的结构性社会排斥，因个人、群体或组织自身功能欠缺而形成的功能性社会排斥，不能参与生产、交换和消费等的经济排斥，无法表达权利等的政治排斥，失去行为、生活发展、价值观及文

化权利、宗教信仰和语言等的文化排斥；自己主观判断的主观社会排斥和确实存在而自己并不认为的客观社会排斥，根据制度、政策及法律规定排除部分人享受正常社会权利的显性社会排斥，由偏见、习俗及游戏规则执行的实际不公正的隐性社会排斥，由于外在并非自愿因素造成的边缘化被动社会排斥，受亚文化影响不认同主流社会而主动逃离的主动社会排斥（Howarth and Kenway, 1998）。社会排斥的测量维度也很多，赫尔瓦斯等将其分为收入与金融服务、消费和信贷、就业、教育、健康、住房与地区环境、家庭状况、犯罪、公民参与九大测量维度，每个维度含有若干指标，共46个指标，并每年更新。英国侧重公民参与社会活动的状态，布尔查德等提出包括消费活动、保障、社会活动、政治活动和社会支持五个测量维度的社会排斥；2000年千禧年贫穷和社会排斥调查提出17个测量维度，包括收入、失业、健康、教育、消费、金融与借贷、住房、自我对贫穷的认知与未来的期望、公民参与等。欧盟社会排斥调查报告提出健康、就业、社会保障、教育、住房五大测量维度（Burchardt et al., 1999；代利凤，2006）。

（六）居住隔离理论

隔离（segregation）表示一种分离或分开的状态，在地理学中通常表示由于地理环境的差异形成的空间上的分隔。国外学者对于“隔离”解释相当纷繁，布劳（P. Blau）认为隔离是指一个群体或阶层中与其他群体或阶层没有社会接触成员比例（布劳，1991），罗伊（Roy）认为隔离是都市居民由于种族、宗教、文化背景、生活习俗、职业类型或收入水平等关系，使具有相似特征的人群聚居在一特定地区，没有相似特征的人群间彼此分开，产生隔离作用，这种地域空间上的隔离使他们彼此产生歧视或敌对的态度。在城市社会空间中，居住隔离，即居住分异，是指社会群体职业类型、收入水平及文化水准等存在差异，由此导致不同的社会阶层居住在不同层次社会空间区域中（黄怡，2006；王道勇和郅彦辉，2014）。

居住隔离（residential segregation）是西方城市的一大特点，是在城市化的快速发展过程中，由大量的不同阶层人员的迁移与流动产生的社会问题。恩格斯（1956）在《论住宅问题》中对19世纪曼彻斯特社会居住空间模式的研究开创了现代城市居住隔离研究的先河。他首次科学地描述了在快速工业化发展中农村居民进城务工，因贫困而自发聚居在城市的特定区域，以及因此带来

的富人和穷人居住空间隔离的社会问题。其后形成了北美以种族文化为核心的城市居住隔离研究、欧洲因社会福利制度影响形成的城市居住隔离和发展中国家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形成的城市居住隔离等居住隔离类型（黄怡，2006）。Massey 等（1996）在研究不同群体的空间分布时，提出居住隔离的空间模型，认为不同群体在空间上的分布可以概括为五个尺度（方面）：第一个尺度是均质性，即特定人群均匀分布在整個城市空间；第二个尺度是集聚性，即特定的人群集聚在一定空间形成聚居区，均匀分布在城市空间；第三个尺度是隔离性，即在特定人群聚居的区域内，周边其他人群较少，形成孤岛分布；第四个尺度是邻近性，与隔离性相对；第五个尺度是中心性，即特定人群集中分布在城市中心。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学者开始关注市场机制作用下的相对聚居现象，最为著名的是拉特可立夫提出的住房过滤现象，新住房的上市使现有住房价值相对贬值，高收入群体因此放弃现有住房而购买新房，收入较低群体抢着使用淘汰下来的降级住房，依此类推，所有住房不断向下过滤，直到市场中的购买力为最弱势者（Wang and Murie, 2000）。同时，也有学者对隔离指标进行研究，其中最著名的是相异指数（indices of dissimilarity）和隔离指数（indices of segregation）（Duncan O D and Duncan B, 1995）。

（七）贫困空间生产理论

区域社会学、城市社会学理论的重要奠基人，法国 20 世纪现代思想大师列斐伏尔认为城市空间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被生产出来的（Lefebvre, 1991）。同样，贫困空间也不是从来就有的，权力和资本是生产贫困空间的机器。资本有三种空间生产模式：资本第一循环生产了流通空间、交换与消费空间；资本第二循环导致城市建成环境的产生，表现为居住空间、各项基础设施与社会事业的发展；资本第三循环是对社会性花费（如教育、福利等）的投入。资本在追逐利润的同时，对城市和地区发展产生巨大影响，并导致城市内部的空间资源分配不平等，如高档住宅区的聚集和贫富社区的空间隔离等问题。在当代城市发展过程中，空间已经成为推动政府调控、市场经济增长和社会阶层变动的重要因素，任由资本对空间的争夺可能进一步恶化城市贫困的状况，并且影响城市贫困的空间特征。所以政府应在市场作用条件下进行合理城市规划，以对城市空间布局产生积极作用；应该鼓励政府通过福利政策并联合地产开发商进行一些投资计划来改善特定区域的城市贫困。城市贫困主体的空